

■ 历史研究

——“守”功成冯子材^①

——杰出民族英雄冯子材的积极防御战术探源

蒋金晖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在督办镇江军务期间,冯子材总结出了一套以弱敌强的积极防御战术,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中法战争中,一举取得镇南关大捷。事实证明:冯子材的积极防御战术在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弥补了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方面的诸多劣势,是独步于时代的先进军事成果。

关键词:冯子材;以弱敌强;积极防御;镇南关大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65-05

镇南关大捷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其主要指挥者冯子材也因此被誉为杰出的民族英雄。然而,这个重大胜利到底是如何赢得的?冯子材又是怎样以装备最差的中世纪军队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的?这些都与冯子材在督办镇江军务期间所总结的那一套积极的防御战术密不可分。

一 积极防御战术形成的历史条件

在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中,冯子材的战争经历和军事才能与湘淮集团的曾、左、李等人相比截然不同,也是因为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在镇南关大捷中的非凡建树。

冯子材的积极防御战术首先源于其与曾、左、李等人不同的战争经历。

当时的曾、左、李等“中兴名臣”,基本上打的都是以强敌弱的进攻战,却极少有以弱敌强的防御战。尽管在湘淮军兴起之初,恰逢太平军势头正盛,因而他们都有过短期被后者包围而取守势的时候,如曾国藩在祁门、李鸿章在上海等,尤其是曾国荃围攻天京时,遭到了企图从外线解救的李秀成等所部四十余天的反围攻。但出现这种情形的时间都不长,很快双方就攻守易势。至于后来的剿捻、剿西北回民起义、平定新疆等就更是如此。

而冯子材却是靠打以弱敌强的防御战而著称的。自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退守镇江起,到同治三年(1864)四月攻下丹阳止的近5年里,他率领万余守军抵抗动辄以数万计的太平军的轮番进攻,打的基本上都是以弱敌强的防御战。这就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实战领会和

总结出一套在人数、装备、素质诸方面相对处于劣势的守军,如何依托坚固有利的地形与阵地,通过积极的防御措施,抵抗强敌并最终战胜对手的战略战术。

镇江位于苏、常等地到南京的中间,陆路相距约180里。清军占领镇江后,在外面的太平军要救援天京,就要受到镇江清军的牵制。清政府为了守住这一战略重地,在冯子材于咸丰末年奉命督办镇江军务后,就一直责令他以守城为主,以攻敌为辅,不可轻易出城攻敌。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的《遵旨力筹防剿折》中,冯子材将清政府的这些指令总结为:“自宜以守为体,以战为用,因利乘便,蹈瑕抵隙,庶足以制贼要害而固我藩篱。”“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察看敌踪,相机办理。”^{[1]99-100}也就是说,镇江守军在战略上要以防御为主,先要加强防御,成为对方“不可胜”的军队,然后才是等待对方暴露弱点,抓住“可胜”的时机主动出击并战胜对方。

清政府的上述指令当然只是些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冯子材自幼家贫而读书不多,但他的悟性很高,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我所用的积极防御战术,并最终迁移和应用到镇南关大战中。

二 积极防御战术:“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

冯子材的积极防御战术诚如其所概括的:“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那么,如何首先创造使敌“不可胜”的条件?

① 收稿日期:2013-03-22

作者简介:蒋金晖(1962-),男,湖南湘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在冯子材身上具体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 为帅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三日,清政府下旨:“冯子材著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所统各营亦归潘鼎新调派。该抚暨该帮办等务当和衷协力,迅速图功。倘各军不遵调度,即严参治罪。”^{[2]295}当时,在广西边关,除了督办军务的潘鼎新,还有早在光绪十年九月便被任命为帮办军务的署广西提督苏元春,冯子材只是个三把手。因此,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帅的支持,从而使自己的战术思想和作战主张得以成为全军的意志,这是冯子材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当时,前敌各路将帅的战略思想并不统一,潘鼎新曾报称:“冯请进剿,苏请暂缓,新拟俟鲍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敌势既分,庶易得手。”^{[3]237}即冯子材主张进攻,潘鼎新、苏元春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应暂缓进攻。为了改变这种决策纷乱的情况,统一全军思想,更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被全军所接受,冯子材当即决定:一、以身作则一马当先,亲率萃、勤两军设阵关前隘,并担负出击文渊法军的重任;二、多方协调巧与沟通,促使主帅潘鼎新授予其“便宜行事”的权力。正月十八日他通过李秉衡禀报张之洞:窃谓用众不如用谋,法枪炮利,用谋自可制胜。文渊用敝部,克期进战。张支持他的主张,并去电帮其说服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3]468-469}但是,既然允许了,就不会只让冯军孤军出击,势必牵动全局。我们看到,自冯子材提议主动出击被“许之”后,潘鼎新的战略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从正月廿四日的消极待援,一变而为廿七日的出兵芄莪迎敌,再变为二月初的回军镇南关一带,以配合冯军出击法军。其中出兵芄莪虽属失误,但却表现出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势,这种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对于调动全军协同作战意义重大。

但是,冯军若要主动出击,就不能严格地“听潘调度”。为此,冯子材在十八日给张之洞的电报中,就要求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奉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现密商琴帅,嗣后事机可否便宜行事,以免延误。”对此,张之洞也表示支持,只是嘱咐他在便宜行事之时要注意尊重潘鼎新:“贵军距琴帅营甚远,兵机瞬息,函商必误,自是至理。但此层宜向琴帅愷切陈明方可,想无不可,进兵时,须预将大略密达琴帅。”^{[3]468-469}随后,张之洞通过致电李秉衡间接地要潘鼎新答应冯子材的要求:“冯军既愿以本部克期进战,甚好,自应听其相机下手。往返函商必误事机,潘帅必已允许。”^{[3]468}潘鼎新对此如何表态,虽还没找到有关资料,但以情理揣测他不会高兴,因为冯子材的要求开始触犯其统帅权威了。但是,既然顶头上司已经首肯,自己对战事又无甚把握,因此,即便有所不满(这表现在他后来极力主张冯军回援钦、廉一事上),也不便公开反对,只好采取缄默的态度:胜了有我一分功劳,败了我也没有责任。也许正是由于此种暧昧,才导致张之洞等后来要求撤换他。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出面反对就意味着默许,而在官场中,默许也是一种不表态的支持,总比明确反对要好。冯子材正是由于争得了这种自主权,才能及时在关前隘修

筑长墙,并部署出击文渊诱敌,从而为赢得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而像黄桂兰、苏元春等副职,则往往消极听命于正职,即使发现上司决策不当,也毫无主见和应变之策,只能坐等失败。

冯子材成为全军的灵魂和实际上的统帅以后,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尤其是临战前夕,能否胸怀全局独立思考沉着处置突发事件,对确保镇南关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冯子材已完成了进攻法军的大部分部署,但由于当时法军通过香港等报纸散布谣言,声称准备进攻北海、廉、钦。张之洞、彭玉麟等广东官员深感守土有责,慌忙之中,于正月二十七日决定从镇南关前敌将冯军十营调回保卫廉、钦,留八营助桂^{[3]472}。此事奏准后传到广西前敌,一直对冯子材无甚好感且“屡电不以冯军为得力”的潘鼎新立刻发电张之洞等:“谓苏元春自芄莪调回,即令冯军回廉。”^{[3]473}如果此时冯子材任其摆布,当然就不会有日后的镇南关大捷了。在此关键时刻,又是冯子材当机立断拒绝了这项胡乱命令。他于二月初三日复电张之洞:决战在即,“材军仍稳据长墙,整备以待。”^{[3]454}这时,离他率军出击文渊只有两天了。冯子材不为这些干扰所动,继续部署抗法战斗。

(二) 治军

在中法战争驰援广西边关的诸多援军中,由广东派遣的冯子材所部萃军是装备最差的。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七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指示冯子材募军十营出征时,谈到配发的装备就称:“军火极力筹办,约计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枝、大吉枪三千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3]522}此处所说的抬枪和大吉枪,即是土造的火药枪,而士乃打则是较为落后的旧式洋枪,至于所谓的“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是否落实还是个疑问。因为张之洞曾告人:“冯军止有枪,并无炮。”^{[3]525}这就严重地影响了萃军的战斗力。以致张之洞在十一月廿九日向清政府电奏冯子材、王德榜两军的情形时,对冯军的战斗力作了很低的评价:“王军老营械足,举动素稳;冯军新集械缺,剽悍轻敌。大约王军宜锐进,冯军宜缓发。”^{[2]236}

如何将这样一支军队整治成令行禁止、精诚团结、协调一致、英勇善战的部队,无疑是“先为不可胜”的重要内容。在治军方面,冯子材采取了三大措施:

一是减营增饷提振士气。冯子材在督办镇江军务之初,面对的是一支派系众多疲沓散乱的乌合之军,包括江南大营溃军、驻防镇江的旗营、地方军队、江北援军、新募勇营以及乱七杂八的多支水师船队。冯子材经过深思熟虑,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上奏《并军撤饷大概情形折》,向清廷汇报了自己的整军举措:将一万三千余名将士缩编为五军二十营,每营五百人,共一万人。改照楚军支应章程,按关放足。“似此因地制宜,变通成法,约计兵饷两额,可减十分之三,粮台不致为难,将士无从借口,庶几军归实效,饷不虚糜。”^{[1]111-112}经此整顿,镇江守军成为一支听从指挥能够打仗的部队。

在广西边关,冯子材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边军的派

系众多,除了潘鼎新、苏元春所率淮军、王德榜所率湘军、冯子材所率粤军以及本地的桂军外,还有杨玉科的滇军、蒋宗汉的川军、道员魏纲的鄂军等。其中,湘、淮、滇、川等客军因水土不服而患病及作战减员等原因,已从当地补充了不少兵员,成分十分复杂,加上新败之余,士气都比较低落。于是,便有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一日冯子材与前来视察关前隘长墙阵地的潘鼎新的一番对话:初一日,“琴帅到王镇勤营,并亲到长墙营垒踏看。材往晤谈,商及进取,琴帅云士气未复,琴帅即回。”^{[3]475}由于电文简洁,冯子材只谈到潘鼎新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并没有进一步谈及他将取何对策:是消极地以此为由而反对出击呢?还是积极图谋振作士气,为出击法军作好准备呢?

根据李秉衡、苏元春联衔于七月二十二日的奏报,我们知道,正是在潘鼎新向冯子材提出“士气未复”问题的前后,冯子材已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提振士气了。

当时,由于战事扩大及补充作战减员,来自各省的前敌各军纷纷招募当地人充当兵勇,以至占有总兵员中相当大的比例。如苏元春从湖南带来的湘军原数一千八百余人,经过八个月的征战,阵亡及病故当不在少数,但却扩充为十八营九千人,其中大部分即为原桂军士卒及从当地人中添募的;蒋宗汉所率广武军原仅三营一千五百人,经过长期征战伤亡及病故,现扩充为十营五千人,其中从当地招募的也不在少数;其他各军,如新募成军的冯子材所部估计也有不少广西人在内。而按照当时的饷制,从广西当地招募的,月饷只有二两四钱,而湘、淮、粤各军勇丁月饷则为四两二钱,“各军饷章不一,勇丁战守同此艰辛,往往有所借口。”厚此薄彼成为影响军队士气的重要因素。

为了在决战前夕提振士气,在二月初前后,潘鼎新不及奏明清政府,就毅然采取“减营增饷”的重要措施。苏元春称:“敌势方张,尤虑兵心涣散,潘鼎新目击情形,因商同臣元春,就各军汰弱留强,减营增饷,核实归并共成四十六营,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均照准军营制,每名月给四两二钱,期于饷归一律,无所借口。维时臣秉衡督办后路事宜,奉章照办,传知各营,莫不感颂皇仁,共图奋勉。惟当凉山、关门失挫,大局岌岌可危,审机度势,若不立予变通,几于不可收拾。乃自加饷以后,桂军皆争先恐后,万众一心,未几即有关前隘大捷,旋经克复文渊、凉山,连下威坡、山庄、谷松等坚垒,一转移间,军事转钝为利,未始非饷归一律之明效。”^{[4]740-742}可见这一措施成效甚大。在这份奏折中,只字没有提及冯子材的作用,但里面提到的“二月初一日”,就是潘视察长墙而和冯会商的时间。而在此之前,潘、苏率带援越桂军已近八阅月,却从未想到这一招。联想当年冯在坚守镇江时也曾采用此法,那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奖惩严明整顿军纪。在坚守镇江时,冯子材就重视运用奖惩措施来整顿军队。同治元年闰八月,他曾上奏清政府,要求给予“此后倘有临阵退缩,未战先溃之员,除都守以下官弁军前处决外,其副将参游各员可否由臣一面锁禁,一面请旨定夺,以振委靡而肃纪律”的权力。清廷批复同意并“即着冯子材宣示各营,俾知儆惕。”^{[1]147}此种做法也被冯子材运用于抗法战争中,在关前隘决战前夕,“冯

子材与诸统领约: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复于各路设卡,以截杀逃者。”^{[2]1455}

与此同时,冯子材还十分注重奖励年轻的下级军官,以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斗志。《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称:“先君任用将弁法,以官阶既高之员,虽未拥厚积,亦已称小康,不免有室家之顾念。其能捐弃生命,冲锋陷阵,百不厌一。除统领、督带为一军之主,不得不任用品秩稍崇者,分掣纲领。其余官营、哨弁,则必遴选官卑职小、年富力强辈充之。职卑者升官心切,非舍命杀敌无以超尘出众;年富力强者心雄胆壮,勇往直前,不甘落后,是以每战克敌,常操胜算,本皆得力于职小年壮辈耳。”^{[5]300-301}

三是临战悬赏激励士气。悬赏是旧时代军队中鼓舞士气的最好办法,但能否施行,还要看当官的经费是否充足。当年守镇江时,冯子材在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就曾上奏,提出“赏恤等用,皆军中必有之需”,然而因“粮台库藏一空,益复无从过问”^{[6]74-75},最终他只得放弃。

在与法军决战前夕,最早提出这个主意的是财大气粗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他于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电前敌:“趁贼垒未定,无论湘、淮、广、桂各军,能出奇兵夺回谷松者赏银四万两,由东省筹款给。”^{[3]460}对此加以发挥和实施的则是冯子材。他在策划进攻文渊前的半个月,即正月二十日,曾致函李秉衡称:“昨接香帅来电,能复凉山赏银三万两。今文渊非重地,但开办始,若不许重赏,不足鼓励将来,现允给大赏。”冯子材的主张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后者于正月二十二日分别复电潘鼎新和李秉衡称:“冯军门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发轫之始,悬赏励士,无所不可。”“如获大胜,准赏。”^{[3]468-469}后来,在作战的紧要关头,冯子材等都实施了这个办法。苏元春事后奏称:“查关前隘之战,各军赏银二万两,楚军赏银一万两,系臣元春及冯子材、王德榜于临阵时许给,克复文渊赏银一万两,系冯子材许给,均经照数提发。又克复凉山省各军赏银三万两,系提督臣原定之数,亦由东省转运照数解交。另有生俘斩首或法目、法兵功赏银两,均经查验明确,分别等差,按名发给,综计为数亦不下二万两。臣等随时散给,宣布皇仁,将士感激涕零,莫不欢如挟纊。”^{[3]442}

(三) 用兵

冯子材充分认识到集中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始终坚持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去弥补素质上的相对弱势这一基本原则。

在镇江时,冯子材麾下的军队只有万余人,而围攻它的太平军却常常是数万、十余万人。因此,守住阵地,进而击退甚至追击对方,就要有效地集中使用手中的这点军队。在镇江的5年中,他养成了集中用兵的习惯,所以,他的万余人,往往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抗法前敌,当时清军各系统的军队约四万人,在总数上较法军占有绝对优势。但在前期作战中,主帅潘鼎新却愚蠢地将优势兵力分成由苏元春、王德榜、杨玉科、方友升及冯子材统率的各五千余人的小部队,分兵进行把守和进攻,致使总数为两个旅团约八千人的法军,得以集中兵力,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集中兵力对清兵各个击破。

而机动性很差的清军却很难在紧要关头互相救援，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最后，只有一个旅团约四千人的法军，都敢对清军发动进攻，并顺利地打进关来。

冯子材深知中法军队的差距，但也看到清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若能集中兵力以多打少，战事还是有转机的。然而在当时，由于潘鼎新派主力出防芄葑的缘故，镇南关前敌兵力分散，关前隘一线守军只剩下萃、勤两军约一万余人。因此，如何及时将出防芄葑的主力调回关前隘后路，以形成绝对优势是战胜法军的重要步骤。二月初一日，冯子材“函商琴帅并致苏提，如芄葑已无贼踪，请苏军迅速回军，以重南关一路。”^{[3]475} 请求潘鼎新召苏元春回军中路。而此时的潘鼎新因恰好张之洞等频频催促冯子材率军回防钦、廉，以为成行在即，于是同意将苏军从芄葑调回关前隘接防^{[2]454-456}。

由于苏元春等的及时回防，关前隘的附近便集中了桂军的主要兵力，计有：冯子材率萃军中左右三军共十营驻守离镇南关十里的关前隘；王孝祺率勤军八营屯于其后半里许以为犄角；苏元春的毅新军、陈嘉的镇南军共约十八营俱屯幕府，在关前隘之后五里；蒋宗汉的广武军十营、方友升营俱屯凭详，在幕府后三十里；潘鼎新率鼎军四营屯海村，在幕府后六十里；魏刚的鄂军四营屯艾瓦；马盛治的六营防芄葑；冯军的六营仍驻扣波，俱在关西百里外；王德榜的定边军十营驻扎油隘，在关外东三十里，后备兵力形成梯形布置。由此一来，在关前隘附近便集中了八十营近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以围歼来犯法军，保证了决战的胜利。

（四）布阵

《孙子兵法》认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2]492-495}

我们先看冯子材在镇江的经历：镇江府城周历十三里，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北面滨临运河，又有北固山峙于近城，形如釜底。清军夺占镇江后，重新加固拓宽太平军所筑新城，自北固山沿江筑城，西至江口包瓦子山，循运河而南薄于西门外，长六里余，上筑六个炮垒，这样，镇江就成了一个由山岭和平地多梯次构成高低火力上下交叉的立体防御，使镇江防务更加牢固，能够抵抗太平军的进攻。

而在抗法战争中，无论是黄桂兰、赵沃守北宁，还是王德榜守丰谷、苏元春守谷松、潘鼎新等守威坡、杨玉科守镇南关、湘、淮、滇、黔等军都因只知构筑平面防御工事而在法军集中而强大的火力攻击下接连惨败。冯子材却不然，他摒弃了要么守镇南关，拒敌于国门之外，要么守凭祥城，保卫行政中心的传统防御模式；通过仔细踏勘地形，终于选择在镇南关后约十里，前不靠村，后不近店的关前隘布阵，利用地形构筑由高低交叉火力组成的立体防御阵地。

关于冯子材选择关前隘作为主阵地的经过，其第六子冯相钊所撰《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称：“先是先君勘得镇南关之关前隘宜于战守，隘之两傍东西两高岭，势如两手向前相抄，中系一坦田坡，乃入关大道所必经，诚一战争之好阵地。……惟关前隘之东岭最前之马鞍山极高，登之

俯视，关前隘一带尽在目中。如敌占踞，以大炮下击，则全战场便无立足地。特令萃字左军督带梁振基于该山扼守。振基挑选先锋队，在山上筑垒五，为坚守计。先君勗勉，认真拒敌，当有重赏，倘失守，即以头来见。”^{[5]302} 其幕僚都启模所撰《冯官保事迹纪实》则称：“十八日，公亲自短衣草履，率领亲军小队，踏勘地势，得距关内十里之关前坳，可以布置。查此坳左右两旁均系高岭，惟中间一道稍为平坦，坳之外树木丛杂，中有两路，一出南关走凉山，一由摩沙出芄葑。遂调部下各营，进扎坳口，筑立长墙，中开大栅门，以便军士出入。萃军九营分扎长墙一带，勤军八营分扎萃军之后，各营相距不过半里，形势极为联络。大营即驻墙内半山，距墙不及二十丈。是月二十三日，公拜谢帮办军务恩摺，并开用关防后，即率员弁扎进坳上。”^{[5]276-277}

冯子材之所以选中关前隘，可能是该处地形正是当年镇江布防的翻版：两面高山护峙峡谷中的长墙，可以构成火力上下交叉互相支持的立体防御，不仅有效地弥补了新募萃军素质低下和装备羸劣的缺陷，而且迫使法军不能集中兵力进攻清军的主阵地，为镇南关大捷提供了重要的地形保障。

以上所说的“以守为体”“先为不可胜”的四个方面还只是单纯防御的问题，而积极的防御还应该包括主动出击的内容，即前面提到的“以战为用，以待可胜”。

在守镇江时，冯子材就已懂得被其誉为“夹击分抄”的战术，即：以内线的主阵地抵抗为核心，外线部队从外往内攻击敌人，以分散对方的兵力，减轻内线的压力。而在广西剿匪时，由于拥有相对强大的兵力，冯子材已经十分熟练地运用这一战术了。

在关前隘决战之前，法军已知清军集中了四万余人的强大兵力，因已调出一个旅团去驰援宣光，广西一线只剩下一个旅团，兵力相对薄弱，法军原来是想固守待援的。但却被冯于二月初五日派小部队夜袭文渊的做法所激怒，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与清兵决战。这种做法甚至连法方也感到疑惑：“尼格里将军带了这么少的人马，怎么去做法方也感到疑惑：“尼格里将军带了这么少的人马，怎么做这等可怕的冒险事呢？在数天前，他不是用一种不予理睬的态度去答复政府表示要他向前进攻的希望吗？”答案是冯子材率军主动袭击文渊的行动改变了整个事态，清军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情势改变了，他（指尼格里）已不是事态的主人，而是被逼居于被动的地位了。”^{[6]442-444} 冯子材主动出击以调动敌人，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否则，如果法军集中两个旅团来攻的话，能否取得胜利，实在没有把握。

在决战之际，冯子材除了亲自指挥主阵地长墙的作战外，还及时调动原来派赴扣波的萃字前、后两军等由摩沙陆续抄截而来，王德榜所率楚军也自油隘出击法军的辎重队^{[6]93}，形成一个内外线共同夹击的态势，迫使法军将本来就薄弱的军队分兵应付，大大减轻了主阵地的压力，为最终战胜法军创造了重要前提。

三 积极防御战术的命运与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军民之所以能够取得镇南关大捷这一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其法宝乃

是冯子材在坚守镇江期间所总结和形成的那一套积极的防御战术,它是冯子材所创造并加以成功应用的独步于时代的先进军事成果。但是战后,掌握奏事权的潘鼎新和苏元春出于忌功和抢功的考虑,不仅对此讳莫如深,而且对冯子材肆意诋毁。先是极力渲染二月初七日法军进攻时的威猛:“将冯军所筑横坡岭炮台四座夺踞其三,居高临下,燃炮对击,冯军几于不支。”^{[2]394}在战争结束后,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首功更被取代潘鼎新出任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苏元春所篡夺,以致张之洞曾义愤填膺去函责备参与操作此事的护理广西巡抚李瀚章:“自南关失守,内地动摇,大局将坏,恃冯萃亭一人安根本,镇游勇,扼关前,散贼党,首倡出关击贼,身先陷敌,转败为功。阁下屡电盛称冯之功不容于口,关外各员探禀电报亦无不推冯为首功。怎乃此次复奏不曰‘冯苏’而曰‘苏冯’何也?且于冯并不专下一语,愿示其故?”^{[3]496}但结果已经无法挽回。

苏元春本身就是传统的进攻型将领,所以在此前的对法作战中屡战屡败;现在既然攘夺了首功,自然在总结镇南关大捷的原因时,不可能褒扬冯子材的功劳,更不可能系统地总结和宣传其积极防御战术在抵抗外敌入侵中的独特作用。以致甲午战争期间,担负抵抗日军的主力部队湘淮军,主要还是倚重进攻战和平面防御战,根本没有吸取冯子材所总结的利用地形构筑立体防御阵地、主动出击以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积极的防御思想,这在叶志超守平壤、宋庆守大东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守旅顺、大连、威海、牛庄、田庄台、凤凰城,则无一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平面防御,轻易就被日军的炮火轰毁而告失败。

冯子材所创造和运用的积极防御战术告诉我们: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由于中外军事实力悬殊,军事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国军队,如果采用进攻战,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奕山所部、定海三总兵所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僧格林沁马队以及在中法

战争、中日战争、抵抗八国联军中的主力湘淮军等。反之,如果实行积极的防御,如林则徐守广州、僧格林沁守大沽口等,则还有可能取得一些有限的胜利。当然,假如守将的军事才能不行,如琦善守广州、陈化成守吴淞口、裕谦守镇江、叶志超守平壤、聂士成守八里台,也会一败涂地。由此可见,在抵御外敌时,研究防御比研究进攻更为迫切,更切合实际,也更有意义。但是,在内战中以擅长进攻而著名的湘淮军诸将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闭目塞听自以为是,在抵抗强大的外敌时,仍旧采用只适合对付“内匪”的进攻战,以己所短攻彼所长,结果无不以损兵折将屈膝求饶而告结束。

在近代百余年来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总是以丧师辱国而含羞饮恨。过去总结战败的原因,多是抽象地从政治层面着眼,动辄归结于军事制度落后、军事素质低下、将领腐朽颞顽、士兵战意不坚等等,因而失败是必然的。本文则试图从具体的战役与战术层面去分析问题,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总结近代反侵略战争的成败得失,以期对相关研究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冯子材. 军牍汇存[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
- [2]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6册)[M]. 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
- [3]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4册)[M]. 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
- [4] 张振鹗.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广西钦州市政协文史委. 钦州文史:第五辑·民族英雄冯子材纪念文集[C]. 1998.
- [6]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3册)[M]. 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

Feng Zicai, Successful Through Defense: On Positive Defense Techniques of Outstanding National Hero, Feng Zicai

JIANG Jin-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While supervising and handling with the military affairs of Zhenjiang, Feng Zicai summarized a set of positive defense techniques and elastically put them to use in the anti-France war, leading to the great victory in Zhennanguan. Facts proved that in wars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in modern history, Feng Zicai's positive defense techniques compensated for the many inferiorities in Qing army's military equipment and qualities. They turned out to be advanced military achievements which took the lead in that era.

Key words: Feng Zicai; the weak overcoming the strong; positive defense; Zhennanguan Victory

(责任编辑 朱正余)